

客家古邑研究文选

主 编：邬观林

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

PDG

前 言

河源，是 1988 年建立的地级市，下辖五县一区。河源是个古老而年轻的地方。所谓古老，她有着二千多年人文历史；所谓年轻，至今年建市才有 20 周年。

河源，原为古龙川县地。公元前 214 年，秦皇朝设南海郡置龙川县，由赵佗为首任龙川县令。赵佗是秦朝平定岭南的功臣，他在中原发生战乱时，绝五岭关隘，在岭南大地建立南越国，自封为南越王。汉王朝建立以后，他接受汉高祖刘邦赐封，臣服于汉朝。赵佗治理南越国期间，为安定岭南，促进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扫除岭南蛮野之风，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岭南文明作出了贡献。赵佗，是岭南大地的千古英雄，是岭南文化的拓基者。“岭南文化始于佗”，史学界对此早成共识。河源是赵佗在岭南最早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在岭南最早管治的地方，据此，毫无疑问，河源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河源是个纯客家地区。关于客家民系的产生和形成，学界虽然各有见地，仍在争论探讨之中，但有一点是比较统一的，即与中原人几次大规模的南迁有关。“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赵佗所带领的并在以后留驻在古龙川的将士兵卒，无疑是最早南迁的中原人。古龙川是岭南客家地区建制最早的县，现河源所辖全部原来都属古龙川范围，所以，河源是名符其实的“客家古邑”。

河源历史悠久，地灵人杰。这里，唐朝曾出过东江第一进士韦昌明，宋朝曾出过岭南第一进士古成之，至清朝，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共出过 27 名进士。这里，在清朝曾有过连平颜检家族“一门三世四节钺，五部十省八花翎”的殊荣。这里，不仅是太平天国著名将领冯云山、石达开的祖居地，还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入粤祖籍地。这里，在近现代更是人才辈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 53 名党员中，其中有 2 名就是河源人。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领导人刘尔崧的故乡，中国青年运动领袖和中国革命审计创始

人阮啸仙的故乡，中国革命文学评论家肖殷的故乡。

河源是有着厚重文化积淀的地方。尽管各地客家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但也各具特色，各领风骚，河源地区的客家文化习俗也有着独特的色彩。千百年来，曾有许多文人骚客对河源的历史和文化进行颂扬，也有许多专家学者和客家文化的爱好者对河源的历史和文化特色进行研究。在这方面，论著不少，成果颇多。但因为各种原因，多散佚在民间，没有形成足够的文化份量。如河源和平人氏徐旭曾，是客家研究第一人，其所著的《丰湖杂记》，开了客家研究先河，被誉为“客家人的宣言”，但并没有形成应有的影响力，知道其人其文的人不多。又如河源紫金县的“花朝戏”，长期以来沉没在民间，最近才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平县的忠信花灯，过去一直被认为民间习俗爱好，最近才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等等，令人可惜可叹！现在，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意见编印《客家古邑研究文选》，就是要弥补过去之不足，将长期散佚的研究成果逐步汇集起来，将丰富多彩的河源客家文化集中体现出来，让人们能更系统地更全面地了解河源，并以此推动今后对河源客家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编印此文选获得了各县区委宣传部、市直一些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司燕仁、李远飞、朱春松等同志的协助，在此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此文选难免有不足之处，请读者见谅。同时，因为时间紧迫，我们没有向收进文选中的文章作者预先征求意见，对此，向有关作者谨表歉意。

2008年7月

目 录

龙川——客家古邑论·····	谭元亨 1
佗城开基客安家·····	李吉奎 10
发轫于龙川县的东江文明·····	杨鹤书 17
东江客家源流考·····	邬观林 23
南越·赵佗·龙川客家——龙川客家来源初探·····	蒋炳钊 35
客民迁徙六次说与第一徙的重要历史意义·····	冯秀珍 49
试论客家先民首批南迁始于秦代·····	赖雨桐 55
赵佗经略龙川与东江流域早期开发·····	司徒尚纪 62
历史上的龙川县及河源县·····	钱林书 71
龙川秦城的军事交通地位·····	王子今 79
赵佗龙川古城考辨·····	魏 平 88
韩愈《左迁》诗之“蓝关”乃龙川“蓝关”说·····	吴金夫 93
李商隐是否到过循州·····	钟林斌 99
孙中山是客家人 祖籍在紫金	
——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潘汝瑶 李虹冉 102
孙中山祖籍东莞说质疑·····	邓铭培 张 杰 124
关于冯云山的家庭情况与后裔问题·····	陈周堂 127
石达开祖籍是广东和平县·····	和平县政协文史科 134
《丰湖杂记》与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问题·····	严忠明 141
论“颜氏文化”的三大亮点·····	谢 骥 150
客家建筑艺术概论·····	张 杰 155

传统聚落的活化：湖口老街和苏家围的初步个案比较

.....	罗烈师 163
龙川居民与江西土客家的血缘亲情.....	万芳珍 176
《南赣乡约》对和平民风的影响.....	苏海文 185
花朝戏艺术概论.....	紫金县花朝戏剧团 191
东源县畲族源流与民俗.....	郑衍华 200

龙川：客家古邑论

谭元亨

2222 年之前，秦始皇派遣的统一中国的大军，挥师南下，越过南岭山脉，一路设置城池、关隘，平定南越，任命年仅 23 岁的赵佗为首任的龙川县令。打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当时所设的南海郡中，只见龙川、博罗、四会三个县名，郡治在番禺。而龙川，是最北面的县份，毫无疑义，它承担了南北交通的枢纽的作用。¹

2200 年后，中国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大京九铁路建成通车，龙川，则是这一大动脉中广东最北的一个枢纽大站。尽管在这之前，龙川在现代交通上，一度相当落后，失去了古代曾有的优势。而现在，除开大京九外，梅河高速、205 国道，也都自龙川经过，还有早已建成通车的广梅汕铁路——粤东通往各地的交通线，都不曾绕过龙川。

不少古城，因古代与现代交通方式的变换，失去了历史上作为交通枢纽作用，并随即丧失了作为文化节点的意义，这可以找出很多的范例，如商朝的故都朝歌，又如作为客家首府的汀州……然而，任凭历史风雨的剥蚀，也任凭古今交通方式的更迭，古邑龙川，直到今日，仍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以今日发达的现代方式，历 2222 年不衰，傲然地屹立在新世纪的阳光下！

对于我，出生在可以说是同时诞生的岭南古邑四会，自小对龙川便有一种神秘的向往。龙川是客家人属地，我母亲祖籍兴宁，当年就是从龙川分出去的，而四会，则是广府人、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各自有一半左右。

老人常说，不知道龙川，就不知道广东的过去。

那么，我们也一样可以说，不了解龙川，就不知道广东的今天与未来。

是怎样的一部历史，是怎样的一种机遇，使龙川始终凸显在南方的辉煌之中？！

¹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

本文试图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去破解龙川这么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化之谜。

二

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往来,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

然而,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是在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才设立的,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100多年。按理,灵渠凿通后,粤西、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然而没有。反而在粤东这边,设立了龙川、博罗两个县,而四会则挨近粤中。所以,秦代的行政设置,侧重在粤东,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后来更到了南海郡治所番禺,因为任器得器重,后来,秦汉改朝换代,他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了。

进一步还当追问,当年秦王50万大军,兵分5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岭南的呢?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瓠)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驂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50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说的,“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饕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饕城为湖南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疑亦为今湖南宁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为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为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联结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 138 个姓，48 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勾连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而当时的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 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咽喉，四州门户。”为“水陆之要道”。

这样，加上粤北“中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中、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当年，西线广信周遭，于西汉年代，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这已为人所公认；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自始兴、曲江、连县至英德等地，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这也成为了共识。那么，作为东线，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

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更多，这说明，龙川的文明开发，早于广信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

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广信、粤北的影响，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广信、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一时的遮蔽，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当大京九又把龙川当作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人们也就免不了“旧事重提”，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

三

其实，今日的河源，包括已有“世界客都”之誉的梅州的地面，当年也都是古龙川的行政区域内。粤东最后立县是秦代，即龙川，而在汉代，才析出兴宁（今梅州市所辖），直到南北朝，方又析出程乡——也就是今日的梅县、平远、丰顺的大部或小部分，据考证，程乡始建制年代，是在肖道成建元元年，即公元479年间，而被推崇的当地客家先民第一人的程旼，是东晋年间从中原下来的，程乡正是因为他的德行而得名。

如以古龙川境为界，他自然比进入龙川的中县人，如著名的赵佗，晚了近700年。当然，程旼也只能是客家先民，因为，作为一个民系的客家，当又在500年之后才形成。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日抵达龙川的中县人（即中原南下的移民）没有随赵佗后来上番禺而留下的，也同样是客家先民的一部分，虽然在人数上不是那么多。从史志上我们可以看到，至明洪武年间，龙川户口只有850户，人口只有1692人，几经战乱，已所剩无几。

但是，在这之前，客家民系业已形成有几百年了。

人们一般把明清年间，尤其是明嘉靖之后，大批的汀江（梅江）流域的客家人进入东江流域，他们在人数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大都是从闽西及梅县等地西迁而来的，是更东的一条线路，即汀州、上杭、梅县、兴宁，这样一条公认的客家迁徙的传统线路。但这条线路，当是宋代以降才形成的。

有人把这视为唯一的客家线路，并排斥其它线路，毕竟，被誉为“客家祖地”的石壁，葛藤坑是在这一条线路的起点。

但是，这却把另一条更久远的客家迁徙线路掩盖了。

如果纸上谈兵，汀梅线路自是唯一的，但只要实地考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秦代大军南下的东线上。

这条东线，我们已在前边详细勾划了出来，自秦以来，尤其是唐宋年间，由于东江航运发达，更成了一条交通的大动脉，而这大动脉的节点，便是在龙川。不难看到，在明洪武年人口锐减之前，作为湘、赣、闽、粤四省或“四州门户”，龙川的航运业、商业是何等发达，人丁是何等地兴旺。这条线路，先于汀梅，且长久得多。

四

其实，从龙川、长宁（含当今紫金、五华等大部分地方）这样的纯客县的方言中，也可以看出客家南迁的又一条线路。

《长宁县志》卷八有云：“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为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为水源音。”

经语言学家考证，所谓“水源音”，也是客家话的一种，这一条，是几经争论并被确认了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毕竟，江西赣州，一直被视为“客家摇篮”，也就是客家民系孕育并诞生的地方，这也凸显了赣南在客家民系发生中的重要地位。而在赣南，客家人则有“老客”、“新客”之分。老客，是南下后一直生活在赣南的族群，而新客，则是南下继续迁徙到粤东梅县、兴宁的族群，他们在明中叶至清代，一枝分五叶，其中一部分人又返流回到了赣南，“新客”一词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操的，自是相对成熟的梅县、兴宁的客家话。

没有走闽西线至粤东的老客，却有不少人走贡水、桃江水一线，到了龙川、河源、惠州一带，他们的语言，也就不曾有经过闽西一线发生的变化，而他们又是沿东江上游支流而下，所以说的话也就顾名思义，被称之为“水源音”，而后到的绕道福建来的，则被视为“客家音”。二者同大于异，只是有些发音不一样。水源音又被叫作“蛇话”，这与其它地方把客家话叫作“蛇话”是一致的。《长宁县志》也称水源音与客家话只“大同小异耳”。这种大同小异，正类似于赣南的“老客”与“新客”。

方言固然是一大证明，这一条，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也是讲过的，“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迹民族迁徙的途径，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徙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²”这就是说，贡水、桃江、定南水至东江的迁徙线路，亦可印证“水源音”为老客语音。

水源音，其方言是从水的源头而来的，那么东江的源头在江西，寻乌水、定南水等，如前所述，这里是中原进入岭南的东线，是粤赣之间的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因此，历史上的中原人、江西人（含赣南人）也就是沿东江及其支流进入龙川，早期则是秦汉、中期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后来则为唐宋，所以它比明代才进入的客家音要早很多，从江西过来的方言，又被称为“蛇音”。光绪《惠州府志》（河源市是新从惠州划出后立市的）称和平县（龙川近邻）“谓父为亚公，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赣”。所以，水源音因为比客家话到得早，才被视为本地话。

这里有两点值得研究：

一是水源音与赣州的“老客”的客家音的关系，语言学家如今已公认水源音是客家话的一种，当然是从发音上予以研究得出的结论，那么，水源音与老客的基本一致，当是很好的证明。

二是水源音作为惠州的本地话，如何解释与广府方言的关系，所谓“惠河片”是否仅仅作为客家话与广府话过渡、混合、交叉地带？众所周知，广府方言形成于汉代，这与秦汉之际赵佗治龙川时间大致相近，广府方言自广信沿西江东行进入珠三角地区，而水源音则是沿东江西行进入珠三角边缘，因此，其源头都应是先秦的雅言，所以是必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因此，两种方言，应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水源音作为广府方言与客家方言交叉混合而形成的“过渡性方言”。确认这一点，龙川作为客家古邑的地位也就无可动摇了。由于各自进入、形成的路线不同，也就形成不同的方言，即便是客家方言内部也一样，所以，水源音作为客家方言的一种，当是较早形成的，且形成的路线也不一样。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说水源音的客家人，比讲梅县话的客家人占有比较优势的地理环境，即河源到惠州，大都与东江的方向相关，故形成“惠河片”方言区，而惠州的文明开发显然也早很多，并在梅州之前一度成为客家文化的中心³。希

²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

³ 吴永章《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503 页

望做方言研究的学者们，更深入的做好调查与考察。

五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明，例如饮食习俗，又如商贸变迁等等。

这里不妨引用许名桥在《揭开 2000 年岁月佗城的面纱》中一段话：

赣南、闽西、粤东、潮汕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极强的互补性。龙川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联接粤东、闽西、赣西的运输干线。龙川之路，曾直接影响和维系着整个客家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客家商业，自盐业开始。自古以来，盐政关系国计民生，古时国用所出，盐利居十之八九，故历代政府都将盐业统管。两宋以前，赣南食淮盐，溯长江贩运，质差而价高，有渔盐之利；宋时潮州盐业已相当发达，潮盐质高而价廉。于是“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虞、汀、赣、漳、潮、梅、循、广八州之地”（《宋史·食货志》），以贩卖私盐为目的，去时往往将潮州沿海需要的土产运出，返程时贩盐并捎带海货。古龙川以河流或古道与赣南各地沟通，客家大三角原始的商业通道逐渐打通。

据现有资料看，早期的私盐大多经过山间小道、河流溪圳，水陆联运以避免官府缉拿。南宋以后，政府必食潮盐，逐步开通一些驿道。明初大力发展水陆交通，一些河流得到疏通，驿道拓宽，古道修复，于是客家大三角地带的商业活动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明中叶以后，农产品商品程度提高，赣南、闽西等客家山区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粮食产品进入流通渠道。茶叶、烟草、蓝靛、土纸、茶油、桐油、夏布、粮豆、竹木等可以流向龙川中转的货物逐渐增多。同时粤东沿海潮汕等地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贸易日益扩大，除了盐运以外，需要经龙川一带中转销往各地的手工业产品、日用百货也日益增多。至清五口通商后，梅州洋货、兴宁布匹、潮汕日用百货亦有相当部分经过龙川中转运输各地。自贝岭至安远鹤子墟，昔日航运非常发达，终年可通五吨之民船，使东江沿线与赣南各属县连成一片。以佗城为中转站前往东江沿线至广州，赣南、闽西山货及土特产贸易也日益扩大。⁴

⁴ 《客家风情》2006 年第 3 期 第 13 页

如前所说，唐宋元明时，东江更成为粤东水运交通大动脉，佗城亦为水陆驿站。闽、赣、潮、梅的山货，广州、惠州的海货，都必需经佗城转运。清代中叶，佗城占槽运、盐运、河务三大政要之利，经济形势达于鼎盛。

六

再补上笔，直到民国，老隆(龙川城关)也仍是交通枢纽，东江纵队当年从香港救出的文化人，也大多数是在老隆转移到内地的。

在文化上，赵佗开基则毋须重复了，虽说几经战乱，龙川一地，也一直作为“客家古邑”显示出深厚的古文化底蕴。嘉庆年间的县志序一中有云“访越王之踪，而井瓮石枯，徒切白露苍霞之戚；吊苏公之泽，而驼迁鹿毁，空怀侠云媚月之思”，乃是哀叹古迹“更不知凡几也”，后来民国县志，更有“自汉迄今，朝代递嬗，名号未变。地灵人杰 彪炳于志者，犹斑斑可考。”的确，早在唐代，韩愈南下潮州赴任，过龙川蓝关，后人在此建有韩祠以纪念，韩诗名句“雪拥蓝关马不前”亦有人考证为此蓝关，因后一句为“好收吾骨瘴江边”以作佐证。及至南汉，龙川（佗城）亦成为 循州的治所。宋代，不仅有著名文学家苏辙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龙川，其兄苏轼亦来此探望，筑陂湖堤灌田，此堤后来亦得名为苏堤，还有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析出一县为和平县，亦一度称阳明县，凸显了这位思想家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建树。

由于东江的优势，民国初年，小电船便始航老隆了，其交通枢纽的作用再度显现了出来，后来，在土地革命期间，更成了东江特委确定的五（华）兴（宁）龙（川）革命中心根据地，并建立过县苏维埃政府。著名革命家古柏亦牺牲于此。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抢救文化人这一轰动世界的历史文件，与龙川密切相关。其中，第一批从香港脱险出来的文化人，在春节前后，乘自己人开的船到了老隆，以老隆为中转站，由连贯负责，各自转送到韶关、桂林、重庆等地。

这第一批文化人中，就有茅盾夫妇，张友渔夫妇、宋之的夫妇、胡风夫妇、还有戈宝权、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周钢鸣等，他们是由东江的短枪队护

送到茶园，再由淡水区委护送，经永湖三栋到的惠州，这才乘上自己的船来到龙川的。

后来到达老隆的文化名人还更多，这就不一一考证了。不难想象，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失去这么一批文化名人，一部现代文化史都无以为继了。他们当中，除文学、艺术、出版、新闻界外，还有法律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的，均是黄钟大吕大式的人物，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均是无可替代的。

龙川，当为这一批历史文化名人受到庇护而增色。

以上讲的是商贸之路，文化之路，语言之路，这已不用证明了。

正由于龙川如此之深厚的历史底气，今日，大京九以它为粤东的交通枢纽，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说，龙川作为“客家古邑”的历史文化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它甚至可以分享石壁的“客家祖地”的一份荣誉，因为，操“水源音”的客家人，并未经过闽西进入广东，而龙川实际上承载了石壁同样的历史文化功能。同样，从“水源”出发，联系到广东把客家菜系称为“东江菜”，那么，对于广东而言，东江当更纯粹为客家的母亲河了。因为汀江接梅江，而梅江下游则为韩江，已是另一个民系潮汕人的所在地了。

龙川，当之无愧地作为客家大迁徙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节点，当之无愧地承担起“客家古邑”美誉！

我们有理由期盼，在客家文化今日的再度振兴中，龙川将发挥更为独特、更为重大的历史作用！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教授）

佗城开基客安家

李吉奎

关于客家民系形成过程，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所论五次迁移说出，几成定论，研究者亦均以“五胡乱华”时期即两晋间为其滥觞。此说颇有实证，即后世所传各姓族谱，为记载其祖先迁徙、定居之踪迹。凡此，是指土族或有谱可查之姓氏而言。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人们对族谱所做的调查，因受各种条件限制，也仍然是极不充分的，难免以偏概全。

众所周知，客家先民入粤，当非止一途，至少是循江西、福建边境迁移，或加上部分由湖南入粤。他们一次次成群地转移，原因在于中原动荡，避难过江逾岭南来。但罗香林和许多研究者都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居住在以今日兴梅地区为中心的客家人方面，从而忽略了秦末以来中原人对岭南地区的移民。客家民系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不过如果将其形成的上限定在“五胡乱华”时期，则似嫌过晚。本文旨趣，是企图表达如下观点：秦末向岭南大规模用兵开始了客家先民的形成过程，龙川(佗城)是最早的客家先民的发祥之地，第一任龙川令赵佗是岭南客家先民之初祖。今请试为申说。

从历史上考察，中原地区居民之大规模到达五岭地区，是在秦始皇征伐岭南之际。客家先民之最初南来，亦即在此时。秦南征的统帅之一赵佗，在平定了岭南设郡县之初，首任龙川令。龙川自是设县至今，为纯客家县之一。赵佗虽在后来任南海尉、南越王，而其作为开辟客家聚落之初祖，其所率南来之人居于龙川一带及所蕃衍的后裔，便是岭南最早的客家先民秦末曾经有三次以上较大规模的中原兵民进入岭南地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¹。”这是公元前214年前后的事，中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向岭南移民。所谓陆梁，据司马贞《索隐》，认为“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称。张守节《正义》则谓，“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徐广《史记音义》记，“五十万人守五岭”。

¹ 《史记》，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53页。

公元前 213 年秦又“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是第二批向岭南移民，其成分是官吏判狱不正确，因而犯罪者，人数可能不会太多。上述各式人等，除 50 万人身份较明确之外，其余为社会地位低下或犯罪之人，数目不详。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当是有来无回，落籍在今日龙川一带的客家地区。谪发贾人及其家属，可以认为是秦朝政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商贾之人随军而南来，若任其自谋生计，贸迁有无，则有助于商品流通、经济发展和税收增加。另据《晋书·地理志》，在秦略定扬越后，以谪戍卒 50 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峽，时有五处，故曰五岭”。“而后使任嚣、赵佗攻越，略取陆梁地，遂定南越”。此处未言及尉屠睢之事。据《淮南子·人间训》，秦使屠睢“发卒 50 万，为五军，一军塞饕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而后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淮南子·人间训》。这里所记的是 50 万卒，与徐广所记的发 50 万人戍五岭，似非同指一事。（谪发之人肯能任战事？）若是如此，发兵平越地，兵数 50 万，异于前述遣戍之 50 万。笔者颇疑上記“伏尸流血数十万”之“万”字，系“里”字之伪。在冷兵器时代，越人甚至连铁器还不会生产，如何能在缺乏统领的情况下以突袭击杀秦兵数十万人？且亦未说明秦丧此数十万众之后，任嚣、赵佗重新领兵征讨，其所“率楼船将士十余万”。是集余众行师，抑从中原重新调兵南来，新调数目多少？对此，史料无证，无法推断。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秦戍五岭之后，由尉屠睢另统率 50 万卒南征。此五路大军，其中屠睢所统一路，因其对地方情况不明，加上对越人政策又犯错误，卒遭灭顶之灾。屠睢已死，改由任、赵统兵，仍前征伐，“率楼船将士十余万”，终于底定南越。任、赵也就随之分别任南海尉与龙川令，所部将士按计划镇抚驻戍，成为秦统治岭南的主要支撑。其中龙川、博罗部分，也就落地生根，即所谓“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了。²

秦军及其后迁徙谪戍人众，基本上是男性即成年男子，他们长期不婚不配，是不利于军心稳定的。据载，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³”。饮食男女，实大政攸关，这是秦朝第三次向岭南地区大规模移民。这些妇女南来，虽使得中原地区“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

² 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第 232 页。

³ 《史记》，同上，第 3086 页。

者十家而七”，不过，她们与驻岭南将士的结合，却成为中原人在岭南得以生息繁衍的基本条件。“谪徙民得依佗以长子孙”，后人所谓“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⁴之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今日客家人当然也是“今粤人”之一部分，在今日纯客家县的龙川，当初组织家庭的南来中原人，自然是“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其子若子，作为客家人繁衍了下来。

赵佗是河北真定人，据清赵文濂：《正定县志》，此真定为汉县，在秦则为巨鹿郡东垣县。从广义上说，也可称之为中州(中县)之人。他离开龙川赴番禺后有多少中州之民留下来，已不可考。有的资料说，“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⁵此之所谓“四家”，似指举家南来之完整家庭。此种情况当时甚少，故明言其数，可为龙川客家先民始祖之例。其余与“万五千人”之无夫家南来后新组织家庭之在龙川者，当不在此数。秦将士与越女结合之家庭，尤不在此数。同一记载称，唐代龙川人韦昌明之先祖，即为此四家之一，系由陕西中部南迁而来者。由秦至唐乾符中，昌明家族之在龙川者“已几三十五代”，与赵佗所凿的“越井”相终始。记述如此明白，可知韦氏一族(应当还有其他姓氏)之人并未因赵佗任南海郡尉而随迁。可见此辈客家先民之定居龙川，是铁了心之人，他们已经逐渐反客为主了。

秦平岭南以后，设南海、象、桂林三郡。其中南海郡设四县，即番禺、龙川、博罗、揭阳。大体上说来，南海郡所辖，相当于今日广东省大部分土地。龙川县设治，对开辟粤东北地区即今日广东客家人居住地区，无疑大有作用。据《隋书·地理志》，平陈后设龙川郡，统县五，即归善、河源、博罗、兴宁、海丰。总户数为6420户。这些县多为新设，系从旧县中析出，今日多为纯客家县。尤可注意的是龙川辖下新设的兴宁，在今日已为客家人中心兴梅地区所在。兴宁是从龙川析出而新设的县分，说明龙川在南朝末期已大有发展。

南齐间，设程乡县，属义安郡(潮州)，为义安六县之一。为何称程乡呢？据《嘉应州志》所载，“是时有南齐人程咬居嘉应州义化乡，后人思其德，名其乡曰程乡，名其县为程乡县”。《嘉应州志》。一个地方能够设治，需有相当的居民与政治文化经济基础。程乡、兴宁设县这件事，表明该地区开发已达到一定的程度，这自然与客家先民的南来有关，因为这两个县是往来闽粤赣三省要冲，

⁴ 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32页。

⁵ 董诰等编：《全唐文》，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9册第8592-8593页。